

让-阿尔伯特·盖耶斯

奥尔良大学副教授，地址：Château de la Source, avenue du Parc Floral, BP 6749, 45067

Orléans Cedex 2；

UMR 8504地理学-城市研究所，CRIA团队，

<jaagui@sfr.fr>;

蒂埃里·雷布尔

皮卡第-儒勒·凡尔纳大学副教授，蒂尔路，80000亚眠；

UMR 8504 地理学-城市研究所，CRIA团队，UMR 245，CESSMA。

<rebourthierry@orange.fr>。

《回购理论》（Rebour, 2000）解释了经济机制如何主导社会的发展及其在地球表面的分布。这种决定论问题同样适用于城市化进程（Rebour, 2011）。以下内容概括了该理论的主要贡献。

1. 经济规律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1. 赎回理论与城市形态理论相契合

赎回理论属于更广泛的理论体系：结构地理学（Desmarais, Ritchot, 2000），该理论基于城市形态理论。根据该理论，我们所经历的物质现实是由抽象的底层结构所组织，这些结构可被想象为层层叠加，深度逐层递增。在空间实践的组织之下，存在着赎回理论的分析对象：经济过程，这些过程本身又受制于更深层的土地价格结构，而后者又由抽象的空间位置结构所塑造，人们追求这些位置是为了获得他们认为可以从中获得的利益（"外部性"）。赎回理论的领域边界就在这个经济层面。而城市形态理论则进一步深入到政治层面：财产规则、政治和社会对流动性的控制、激励社会群体行动的人类学价值观。

回购理论借鉴了城市形态理论的一条法则：空间差异先于其经济价值而存在（该假设见于

在外部性问题中)。

1.2. 赎回：失衡增长的法则

在历史上，生态圈中的地点被赋予了或多或少的象征意义（这里涉及城市形态理论）。土地在过去要么被视为禁地，如圣地，要么被权贵所垄断（例如封建领地）。由此延伸：所有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土地和资本，都处于“价值空间”之中。

这个“价值空间”因各种原因而备受追捧，其原因更多是人类学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Rebour, 2000, 第八章）。然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禁令”被取消了。通过货币支付“回购”土地，将其转移到“财富空间”，并转化为生产要素。

在货币化经济初期，最早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最初是个人）开始了对此前未进入市场的土地的收购（最初是租赁）过程。为此，他们必须先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创造盈余。这种额外生产力通过货币创造行为获得偿付能力，换言之，通过借款来支付地租，并利用购回土地在第一个经济周期内成为生产要素后产生的未来收益来偿还借款。但在收购过程中，在预付地租后、新土地投入使用之前，土地出租人就提前进入生产周期，将地租花在了商品市场上。因此，经济循环中出现了先于生产的新“外源性”需求。价格上涨，领先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而这些要素的收入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上。结果，经济在失衡中增长。在下一周期（得益于新开垦的土地），产量的增加往往会恢复平衡，但新的收购又会发生……通货膨胀的增长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企业家的利润和租金相互支撑。收益不断增长（这使得在辉煌的三十年里，实际上是从旧制度结束时起，工资水平得以保持在较高水平）。此外，*这种趋势*还因出口而得以延续，出口取代了本土收入来购买产品，这符合罗莎·卢森堡所说的“帝国主义”观点。

1.3. 历史上的土地回购*趋势*、“外部性替代”与城市化

在欧洲，土地私有化是中世纪和近代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圈地运动以及随后“国有资产”的出售，使原本被排除在外的土地进入市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当这些国有资产在复辟时期归还给归国的移民贵族时，其中大部分又退出了市场。不过，土地涌入市场的历史性大浪潮因此得到了加速。然而，要获得完全所有权的赎回权，人们还必须等待辉煌的三十年。

此外，自中世纪末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饥荒发生频率降低，对生计的担忧也变得不那么迫切，一场持续数个世纪的"外部性替代"运动将乡村的价值转移到了城市。在农业价值体系（*Verlagsystem*）盛行时期，除食物之外的必需品（服装、纺织品、取暖能源、交通工具等）最初由农村生产，而随着外部性替代将价值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些产品开始在城市生产、加工或包装。这种空间转移伴随着手工业、随后是工业的大规模集中化运动。因此，城市化得以发展。这种"外部性替代"的过程是赎回理论的一条定律。由于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价值可以被视为一个给定且恒定的库存量，因此外部性的替代必然会提升一个地方的价值，同时贬低另一个地方的价值（价值守恒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存在理论上的差异：一类是与某地抽象价值结构相关的外部性（强义），另一类则是可称为"简单"的外部性（弱义），仅指某地的便利条件，这些条件使其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吸引力，从而形成"区位租金"；这两种情况往往同时存在。

工业革命期间，城市外部效应日益增强，工业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强大动力。尚未进入市场的广大土地得以分割出售，部分中下阶层因此得以参与土地收购。1945年后，收入增加的中产阶级广泛参与了尚未进入市场的土地或住房收购。

自1990年代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要么得益于社会群体收购原属集体的土地（这些群体具备相应财力），要么在缺乏收购机制的情况下依靠向发达国家出口实现。

另一项基本法则：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在各大洲都受到回购动态的节律影响。在回购逐渐消退的国家（因缺乏可回购的价值或缺乏回购手段），曾滋养其经济的经济乘数循环正逐渐消失。这些国家陷入长期萧条（欧洲自1970年代以来便是如此），至今仍未找到新的回购动力，使其重回上升趋势。

这种我们称之为"危机"的长期萧条状态始于"节点点"。理论上，当所有土地进入市场时就会出现节点点。但节点点本身意味着一种平衡，而回购机制却禁止这种平衡。在失衡的经济现实中，当超过一半的价值储备被回购，且财富（货币化经济中的生产，等于要素价格）超过其价值时，节点点，即回购系统的阻塞就会发生。由于商品价格不再受到市场价值注入的刺激，它们往往趋于停滞，随之停滞的还有与通货膨胀（以及工资滞后于价格）相关的利润。为了恢复价格上涨和资本持有者的利润，必须摧毁财富并重新创造

价值相关性不可或缺；换言之，根据供需法则，必须降低产量以支撑价格。因此，生产或至少生产率必须下降，才能重新刺激通货膨胀。此时，收益开始递减，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家通过短周期、分段式生产来恢复利润，以维持一定价格水平，而购买力则呈下降趋势。经济成为零和游戏，甚至负和游戏，并伴随着资本的破坏或贬值，原因同上。

然而，在萎缩的经济中，外部效应的替代效应却有利于大都市，它们保留了若干价值核心和外部效应潜力，并满足了刺激其发展的全球需求。然而，大都市地区的土地溢价并非源于持续的收购，而是源于需求的地理和行业（经济）两极分化。

在节点处，只剩下供求关系和投机行为来决定价格和地租水平，而地租已不再与创造新财富的机制相关联。

2. 回购与城市化的空间效应

2.1. 可逆的集中/分散定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收益必然递减（短期内可能保持恒定）。其地理后果是要素在空间上的均衡分布，即某种程度的分散。

- 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Starrett, 1978）。在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中，要素流动性理论上能修正不同区域间的生产力失衡，使其趋于均质化（Aydalot, 1980）。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递增收益来解释地理两极分化是“非正统”的；但在某些条件下（见上文），被收购理论以及新地理经济学（NEG）所认可（Combes, Mayer, Thisse, 2006; Bourdeau-Lepage, Huriot, 2009）所认可；更不可忽视的是，该理论已得到历史现实的验证——几乎所有新古典主义“大师”都承认，递减收益只是数学上的便利工具，用于计算导数，否则无法证明均衡性。

回购理论通过经济基础法则解释空间动态。递增收益促使生产要素聚集，而这种聚集又带来正外部性，进一步提高收益并促进交易。剩余释放与递增收益：这是城市化的关键，而城市化正是向心地理流动的结果。但在收购理论中，简单的外部效应并非城市化的根本且充分的解释：重要的是处于增长趋势中的失衡经济中的决定性过程。外部效应只是提供了在时间和空间上可移动的空间锚点，经济失衡在此基础上

经济失衡在此处发生。在（失衡的）积极趋势中，推高地租的并非需求，而是强意义上的外部效应，即价值核心的存在：因此可以说，土地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它价格昂贵；因此地租并非供需关系的结果（或至多只是边缘性的结果）。

在节点处，当收益递减危机出现时，动态会变得离心化。生产要素开始分散，因为空间积累对利润形成已不再必要。此外，新的细分生产往往靠近本地市场，而外围地区的土地租金较低，这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

地理空间反映了经济失衡对其造成的形态影响；反过来，这些不对称的建筑物、空间的物质断裂，既阻碍了可能的平衡恢复，也抑制了可能出现的新动态。

2.2. 城市等级制度；租金调节作用法则

城市化在地域上延伸出一张按规模等级排列的城市网络。"规模-等级规则"被认为能解释城市按规模排序的统计分布，但这可能只是"数字游戏"（Christaller, 1933），将现实建立在随机过程中，这无法解释太多问题；H. Le Bras（1994）更严厉地将该规则比作“具有寓言性而非科学性的数学实体化”。而赎回理论则通过土地租金的作用（Rebour, 2011），在经济领域将决定论过程引入这些分析，并借鉴了其他研究者的成果：Kingsley Davis（1976）和François Moriconi-Ebrard（1998）。

在研究的国家中（Rebour, 2011），规模-等级分布呈现为一条曲线，可分为三个部分：基部（最小聚居区）相对萎缩；顶部（大都市）相对膨胀；中部（大中型城市）相对均衡。

F. Moriconi-Ebrard用数学公式描述了大都市的过度膨胀现象，他称之为"大都市化定律"。

金斯利·戴维斯的研究表明，在等级-规模曲线的中间部分，存在一种由"谐波函数"的2因子调节的几何级数增长：排名第1的城市人口等于排名第2和第3的两个城市人口之和，该和又等于排名第4至第7的四个城市人口之和，以此类推。例如，如果城市1有100万人口，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城市各有人口50万，再接下来的四个城市各有人口25万，再接下来的八个城市各有人口12.5万，以此类推。

赎回理论给出了一个普遍的解释。地租在空间上造成了不连续性。在生产力最高的地区，地租达到最高值。市场创造的财富中，约一半（包括土地、住房、工厂、原材料等所有租金）用于支付租金。在增长趋势中，资本与租金相互平衡、相互抵消。生产力潜力最大的地区

更强劲、收益不断增长的城市支付着最高的租金；因此，租金取决于城市规模。土地价值与城市规模相关。地租决定了和谐平衡的等级结构（在等级-规模曲线的大部分区域），限制了城市按其规模比例的增长，而地租过高的因素则退居等级结构的较低层级。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市场通过对生产要素施加约束来重新平衡空间，这些要素的聚合受到调节，从而决定了城市等级结构的形态。然而，这种土地约束可能会被资本的空间流动所抵消。

在大都市中，向心资本流动增强了资本的强度（超额生产力），并成功对抗了地租的制约。这种资本盈余在城市景观中表现为建筑物高度的提升（固定资本）。与收益增长相关的经济不平等导致财富在地理空间上成块聚集：这些资本“块”正是大都市的起源。

但大都市的额外资本必须从某处获取：来自乡村和小城镇，这些地区的外貌特征本身就揭示了资本的匮乏，因此也缺乏房地产。作为大都市过度积累的负面对应物，较小聚居区、村庄和乡村的萎缩，在人口和资本方面滋养着大都市的过度膨胀。等级-规模曲线的基底受制于外部性替代法则（§1.3），这些法则强化了大都市的优势。农业价格极低是另一个表明价值从农村地区向大都市地区转移的迹象。为使论述更全面，还应补充说明：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与外部性替代相对应的生产要素流动也可能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城市向最具活力的都市转移。

2.3. "地理空间的三形态"

无论如何，“地理空间的三形态”（Rebour, 2011）因此将空间分为三种类型：

- 大都市区，资本密集度成功突破了地租通常对城市化造成的阻碍。具体而言，这种“大都市化”表现为建筑物的高度增加，这既是资本丰富的标志，也是土地限制减弱的标志，因为居住面积随之增加。
- 城市空间：地租与资本达到平衡。地租阻碍城市发展，其程度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因此呈现出阶次与规模的谐波关系。
- 农村地区：低微的租金阻碍着本已稀缺的资本流动；这些地区因大都市的资本抽离而日益贫瘠，正是资本的缺失导致了建设的不可能，而建设恰恰是乡村景观的根源所在。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向大都市转移的价值就越多；因此，大都市的规模和财富必然受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因为大都市从农村抽取的资本并非无限：必须给农民留下生存的空间。

最后一点阐明了F.莫里科尼-埃布拉尔提出的"大都市化规律",即大都市人口是城市人口的函数:众所周知,城市化程度取决于农业生产力,而我们刚刚证明大都市化程度也是如此,因此城市化和大都市化最终都取决于农业生产力水平,这正是莫里科尼-埃布拉德"定律"所表达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自经济达到节点点(与大都市的物理拥挤程度趋于一致)以来,这种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活动和人口向外扩散(城市化进程),城市增长不仅逐渐枯竭,而且大都市的超生产力本身也受到危机的影响(参见下文第1.3节),变得越来越具有选择性。相应地,各层级的周边地区重新焕发活力,这相当于对近千年来旧有的向心动力进行了真正的空间逆转。政府当局未能理解这些变化,如今正资助既昂贵又徒劳的规划方案,试图将外部效应转移到"多极化"空间。如果空间确实反映了这种新的经济动态,那么在经济政策日益试图消除不平等,无异于试图填满达那厄之桶。

3. 地理形态及其构建——空间形态的规律

赎回理论解释了经济与城市、大都市、城郊和乡村的形态及景观之间的联系。该理论借鉴了城市地理学中公认两种主要形态类型。

- "中心化"形态:聚居、同心圆状。
- "离心型"形态:"扇区型"、线性、轴向。

赎回理论将这些形态与塑造它们的资本和劳动的空间动力学联系起来:或向心,或离心。这些流动性既可被掌控,亦可被迫承受。这些空间动力学最终在经济繁荣、上升期,或相反的萧条、危机时期发挥作用。

时间与空间中的行动决定论,最终形成主导性或次要性的空间进程,这些进程与前者相辅相成。

3.1. 中心化形态

3.1.1. 在购买力较高的社会中:圆形形态

在此背景下,经济形势呈现衰退或停滞态势,唯独"辉煌三十年"时期例外——当时生产和生产率的强劲增长(与引入巨额市场价值的完全产权回购计划相关)推动了经济增长期实际工资的上涨。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工资确实呈现出几个世纪以来的反周期波动趋势,更确切地说,是工资的上涨决定了这些中心化形式的存在。城市聚集着购买力强的居民,成为经济的中心。资本受城市市场的吸引,也顺应了这一趋势。

人口

富裕阶层能够控制其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分为向心型（向具有外部效应的城市聚集）或离心型（逃离），依据吉尔斯·里肖（1985）提出的空间动态分类法。这种整体形势被称为“寄生”，因为消费优先于投资（相反的情况也有弊端，下文将进行阐述）。这种情况的顶点是“寄生危机”，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中世纪的衰落，1300-1450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但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复苏得以重新启动，这得益于实际工资（矛盾的是，实际工资非常高）的消费潜力，于是扩张接替了危机。

正如我们所见，“辉煌三十年”的经济形势是历史上一个特例，其特点是高增长率与高购买力并存；当时，农村人口外流推动了城市发展，形成了一种向心动力，尽管郊区通过间接离心运动（市中心密度过高且租金昂贵，无法容纳这些向心迁移人口）。

在这些购买力高的社会里，空间吸引点呈现点状分布，即购买力发挥作用的市场，从而形成环形聚居区和同心圆式的空间布局。同样，在乡村地区，也形成了“堆积式村庄”和环形农地，这些农地因圆形的自然分割而分解成矮胖的块状地块。

这种环形或同心圆布局与阿隆索和伯吉斯的模型相似，收益从中心向外围递减。冯·图恩的同心圆模型同样适用于生产活动的选址以及城乡景观的规划。

3.1.2. 中心化形态的城市网络

对属于循环模型的城市网络进行分析（在城市网络层面）时，会引入不连续性——即城市之间的距离——这些距离具有一个显著特性：等距性，这使得城市间的运输成本得以最小化并趋于均衡。这种空间结构似乎与地理学中一个著名的模型相吻合：即沃尔特·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模型，奥古斯特·洛施于1940年试图将其形式化。但需要注意的是，赎回理论中的“寄生”网络（失衡模型）与洛施和克里斯塔勒的模型（均衡模型）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差异。在收购理论中，城市间等距是寄生城市网络的特征，而城市层级结构则属于另一种因果关系：它们源于土地租金的空间结构及其背后的经济与空间动力（Rebour 2011；上文：§2.2）。相反，在Lösch和Christaller的理论中，等级结构是该模型固有的，是与商品“覆盖范围”（运输成本抵消利润之前该商品可能销售的距离）和“门槛”（实现足够收入所需的生产量）概念相关的基本特征。因此，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网络一方面由客源区组织，这些客源区使等级化的城市中心保持均匀间距；另一方面由城市外部性组织（市场的存在；促进生产者集群的规模经济）。每个城市都是

位于与其等级相符的影响范围中心，局部空间平衡决定了城市间的总体等距关系。贸易在中心市场或等距分布的次级市场中达到最大化，从而优化了对当地居民的销售。

此外，空间均衡——作为洛施及其众多追随者的核心概念——仅是赎回理论的一个特例（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这种设定并不现实）。在该理论中，凡是工资高于该生产率的空间（参见§3.1.1），同样会形成等距城市网络。总而言之，赎回理论中的“寄生”城市网络既不遵循与克里斯塔勒相同的因果关系，更不遵循相同的范式。赎回理论还揭示了洛施理论化的矛盾之处：他（必然地）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来解释城市化，但这与新古典理论（Aydalot, 1980）的空间平衡相悖，而洛施却试图将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与新古典理论联系起来。

有趣的是，回购理论虽可“回归”至克里斯塔勒所识别出的形态，却对其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而规模经济（“收益递增”）的动态作用——我们稍后将看到——在长期“扭曲”的经济形势中展现出全部力量，这与本段所述的“寄生性”动态截然不同。因此，回购理论中的城市网络模型避免了洛施和克里斯塔勒模型常被批评的静态性问题，因为（与所有空间结构一样）这些网络会根据长期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不同的组织。因此，在“寄生”状态下，经济失衡会产生与有利于劳动者的生产率/工资差距相关的中心化形式（Rebour, 2000, 第十一章），但在通货膨胀增长趋势（参见§1.2）下，“反常”状态下的相反失衡则有利于资本持有者，大大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从而改变了城市群及其网络的形态，使其变得偏离中心。

3.2. 偏离中心的城市形态

3.2.1. 强大的经济决定论

假设我们处于一种收益和产量不断增长的经济形势中。经济和社会失衡也在加剧：需求（年金领取者、投资者）领先于产量，利润领先于工资。这种通货膨胀推高利润、削减工资的经济形势被称为“反常”。这种增长模式推动了城市聚集（§2.1）。空间动态呈现向心趋势，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城市不断扩张，移民潮涌入，但往往被排挤到郊区，这扭曲了原有的环形组织结构。

历史上，诸如“美好”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虽然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但也催生了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这些动态在城市组织中得到体现：工业区、富裕区将城市肌理分割开来。

在主要区域（自1939年起，霍伊特模型反映了这种组织结构）。面对雇员购买力薄弱的现状，生产型城市群必须将未在当地消费的部分（有时占多数）产品出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空间吸引点成为轴心，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出口潜力，同时降低运输成本。交通轴线引导着这些新“偏远”社区的发展，并决定了城市内部的部门结构。城镇沿着交通和运输轴线扩展，以促进主要出口。城市中心网络也因此被合理地解构。

3.2.2. "偏远中心"网络

商品和资本在城市网络中进行大规模流通。位于其路径上的城市群因此得到强化和振兴，同时出现了偏远地区。克里斯塔勒的既有网络因此被这种“逆向流动”所扭曲。例如巴黎-鲁昂-勒阿弗尔、巴黎-里昂-马赛等轴线，以及北部和东部的工业区。在这些具有国家甚至地区重要性的轴线之外，昔日的次级中心、前时期的核心地区正在衰落。只有位于新发展轴线上的中心地区才能延续其增长势头。这些既是中心地区又是偏远地区的城市，很可能正是大都市的起源地。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它们都在持续增长：在危机时期呈现寄生式增长，在经济扩张时期呈现逆向增长。某些地方行政中心却并非如此，它们恰恰是这种外部性替代的主要受害者。例如，德拉吉尼昂这个小行政中心，因其在瓦尔省的中心位置而在革命时期被选中，最终却被位于地中海沿岸扭曲轴线上的港口城市土伦取代了省府地位。许多小副省府也因经济增长的扭曲浪潮而消失。

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

随着经济规模的变化，强大的外部性替代效应重新塑造了地理空间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网络具有很强的惯性，有时即使经济形势已发生变化，仍可能维持其原有形态，尤其是代表重要市场的最大城市。但正如我们所见，大多数大都市既处于中心位置——位于嵌套六边形的中心——又处于偏心位置——位于主要轴线上——例如欧洲大陆上的巴黎、伦敦或莫斯科。

节点点的出现深刻改变了局面。

3.3. 节点点的城市形态与离心式去城市化

经济已丧失增长能力。长期危机的特征是收益递减和萧条，伴随着实际工资下降。正因如此

我们才看到上述某些"反常"机制的出现。大量寻求投资机会的资本难以投入，难以刺激本就疲软的需求。因此，在政府支持下的大型城市规划和建设项目往往成为它们的救命稻草。

3.3.1. 城市形态呈现区域化但离心化

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加剧了主要城市区域之间的对立。

企业尝试远距离经营，因此沿着外向型交通轴线选址变得至关重要。创新型企业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分散策略，尽可能靠近他们所发现的、因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而日益细分的本地市场。

大量低收入家庭和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正向城市边缘地带迁移，那里土地成本较低，尤其是在远离商业中心的盲区。

因此，空间动态呈现离心趋势。城市扩张和城郊化正在蔓延。城市正在瓦解：这个过程可称为"去城市化"（Ferrier、Guieysse、Rebour，2010），因为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一直依赖于向心流动。

3.3.2. 危机中的"中心/外围"形态

离心流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形成了扩大的"离心-圆形"形态。这些形态是近远郊城市化的扩散光晕，最终延伸至贫困的乡村地区。因此，危机中的城市聚居区也会根据空间财富差异呈现出环形格局，要理解这种格局，就需要将分析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

这些光环显得尤为明显，因为出口轴线支撑的线性形态只从仍然充满活力的空间发展而来，而这些空间目前往往只滋养着大都市网络。然而，由于贸易（尤其是进口贸易）远非微不足道，"扭曲结构"通过特别密集和/或被重视的轴线以及被边缘化的城市周边贫困人口所形成的盲点而显现出来。这些人群因必须长途通勤到远方工作，且只能开车前往超市而陷入困境。节点空间布局造成的这种不稳定生活状况，尤其塑造了"激进"和抗议性投票的分布图。

3.3.3. 多尺度离心动力、空间逆转与大都市化

大都市化进程处于一场零和甚至负和的宏观经济与地理博弈之中。这并非城市化进程，而是危机期间地理空间发生的深刻变革，使不同层级的地域陷入竞争。前文分析的大都市过度扩张，正是

一种地理形态的"节点"经济，其收益递减，无法再滋养整个社会和地域。被遗弃的边缘地带包括贫困的城市社区、农村地区、小城镇以及中等城市。全球化和都市化催生了一个充满隔离的城市群，除了虚幻资本（投机资本）的生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发展规划。

危机的离心动力及其伴随的外部性替代效应，甚至可能导致空间层级结构的逆转，尤其在区域层面。危机导致旧工业区（昔日的"偏远中心"）财富毁灭，并将部分相应价值转移至昔日的边缘地带。因此"南方"地区开始崛起、发展，从而重新获得此前被"北方"剥夺的自主空间。在工业化国家，部分大都市（但并非全部）免于衰退，而在"南方"地区，整个区域都出现了发展复苏，尽管与发达国家不同，农村人口外流现象依然存在，这反而有利于城市发展。

总而言之，四十多年来，一种全新的离心动力在发达国家各层面上占据主导地位，与千年的历史趋势相反，它使周边地区受益，而中心地区则遭到边缘化：区域层面的城市周边化、国家层面的旧有分界逆转、国际层面的全球化——在经济活力和资本流动方面，"新兴工业国家"正在取代甚至威胁着三极体系。

赎回理论将社会组织与地理空间置于历史进程之中，置于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之中——其组织与融资机制已然触及极限，至少在当今工业国家如此。

在尽管如此仍在边缘地带蓬勃发展的众多倡议中，我们仍需寻找可能的新起点...一种新的救赎形式？

参考文献

Aydalot Ph., 1980, 《空间动力学与不均衡发展》，Economica出版社，巴黎，第2版，352页。

Bourdeau-Lepage L.、Huriet J-M., 2009, 《当代城市经济学》，巴黎，Economica出版社，370页。

Combes P-P.、Mayer T.、Thisse J-F., 2006, 《地理经济学》，巴黎，Economica出版社，397页。

克里斯塔勒 W., 1933, 《南德中央地点》，耶拿，古斯塔夫·菲舍尔出版社，331页；1966, 《南德中央地点》，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新泽西州），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230 页。

戴维斯·K, 《1950-1970年世界城市化》，伯克利：加州大学国际研究所，1971-1972年；第1卷：城市、国家和地区基本数据

地区基本数据; 第2卷: 趋势、关系和发展分析。

戴维斯·K, 《1976年世界城市化, 1950-1970》, 格林伍德出版社, 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 319页。

德马雷斯·G、里乔·G, 2000, 《结构地理学》, 巴黎, 阿尔马坦出版社, 147页。费里耶·J-P、吉耶斯·J-A、雷布尔·T, 2010, 《发达国家的城市扩张——去城市化还是后城市化?》, 萨尔布吕肯, 欧洲大学出版社, 200页。

勒·布拉 H. (1994), 《地球的极限》, 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巴黎, 348 页。

莫里科尼-埃布拉尔 F., 1998, 《都市化法则: 城市系统增长模型》, 《里昂地理学杂志-地理十字路口》, 第73卷第1期, 第55-70页。

55-70页。

雷布尔·泰奥, 2000, 《收购理论——地理、经济、历史》, 巴黎, 索邦大学出版社, 258页。

雷布尔·泰奥, 2011, 《城市等级制度——地理空间的三形态组织》, 萨尔布吕肯, 欧洲大学出版社, 248页。

里乔·G、费尔茨·C (1985), 《城市形态与社会实践》, 蒙特利尔, 序言出版社, 303页。

Starrett D., 1978, 《自由流动模型中的地点选择市场分配》, 《经济理论杂志》, 第17卷, 第21-37页。